

“在哪跌倒就在哪趴着”? 生态欠账总是要还的

本报评论员 吴迪

察整改工作不力,长期野蛮开采,甚至顶风新建生产设施,生态破坏严重;一些自然保护区管理严重缺位,大多形同虚设,甚至未按要求实施保护导致保护区名存实亡。

又是生态环境问题“整改不力”“顶风而上”,又是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点名批评。新闻中的一些措辞似曾相识——早在2017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时,就通报过海南澄迈县毁坏红树林问题;去年8月,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办公室点名批评当地“没有按要求整改,反而顶风而上”。如今,通报中再次指出该地“有企业第一轮督查发现的违法行为仍在继续”。

真是“年年岁岁花相似”!面对督察组指出的新老问题,当地理应立即叫停违法违规开发,对症下药解决问题,然而,有的职能部门“相互观望、上下推诿”,坐视一些企业顶风而上、一些问题积重难返、一些保护区名存实亡。

为什么行动迟缓?为什么相互观望推诿?为什么顶风而上“势不可挡”?大概率还是因为地方“唯GDP”思想在作祟,“先污染

后治理”观念迟迟未能纠正。比如,在“围填海开发”、随意变更生态保护区土地性质等案件中不难看出,要钱还是要环境,相关决策者没有做出正确选择。有的地方对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和利税大户“没脾气”,督察组前脚刚走,一些企业后脚就顶风而上,甚至在公安立案后还在继续违法行为——谁给的底气?谁惯的脾气?

其次,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做法阻碍了相关工作的推进。有关部门上级检查台账就算监督,下级交表应付就算落实,“平时不作为、急时乱作为”,敷衍整改,遇事“推一推、放一放”,少数地区为了应付督察组而出现的“变通版”“升级版”整改更是令人咋舌。

让人深感不安的是,诸如毁坏红树林、在自然保护区顶风违建新项目等生态环境问题被拖成了“连续剧”,长此以往,生态环境伤不起,百姓伤不起,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同样伤不起。

怕就怕个别地方存在“歪嘴和尚漏风庙”。保护绿水青山,有时难点不在技术或资金,而在于一些地方在发展理念上的短视与

错位,甚至在于个别地方政治生态有问题而形成种种阻力。

一个地方要发展经济,如何利用、保护生态环境是绕不开的问题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,这是对治理理念、智慧和能力的考验。如何扎紧制度的篱笆,让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给予更多重视,让相关执法者在不法商人“围猎”时无机可乘;如何让发展理念迈入新时代,在提升GDP上多一些绿色注脚,显然都是各地应该加码的功课。比如,重庆试点推行领导干部离任“绿色审计”,在领导干部离任时不仅要经济审计,还要进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,督促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,就是不错的尝试。

“在哪跌倒就在哪趴着”,于上于下,于情于理,都过于奇葩,实在不该。希望在中央紧盯之下,对失职渎职者及时启动问责,该补漏的体制机制要快一点健全起来,该恢复的生态环境早日恢复到原来的模样和活力。期待各地能够积极主动地“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”,分内之责,不可推卸。

社评

中国新闻名专栏

怕就怕个别地方存在“歪嘴和尚漏风庙”。保护绿水青山,有时难点不在技术或资金,而在于一些地方在发展理念上的短视与错位,甚至在于个别地方政治生态有问题而形成种种阻力。

据5月10日中新社报道,日前,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海南省反馈督察情况,指出海南重开发、轻保护情况较常见,有的部门和地方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不作为、不担当,甚至推诿扯皮;有的企业对第一轮督

让快递柜成公共设施,或许是未来趋势

舒圣祥

丰巢收取超时费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。不少小区选择停用,多地监管部门也发声回应社会关切。5月9日晚间,丰巢对收费政策进行了解释,表示免费保管12小时是基于派件高峰时段的推算,“为了鼓励用户及早取件”,“提升资源使用率”。(见5月10日《财经》)

快递柜企业想赚钱无可厚非,但引发公众不满,就值得反思了。很多人说,这是丰巢在用户习惯使用快递柜,且近乎垄断快递柜市场时,想“收割”一把。“提升资源使用率”也好,“收割”也罢,争议之后还是要讨论出路的。

事实上,快递柜进小区的成本并不高,未出占地费的也不少。相关企业刚宣布收费,很多小区就决定停用,就是因为其违背了进驻时的谈判内容。如果快递柜少了公共属性,成了一项生意,进驻小区就没那么容易——你可以向用户收费,小区为什么不能向你收费或提高占地费?快递柜占用的是业主公共空间,给公共设施免费使用没问题,但给商业活动使用则需要另计较——总不能占业主的空间做生意,还要让业主掏钱吧?丰巢可能没考虑到,快递柜并不是建在无主的土地上。因为其自带公共属性,才大范围进驻小区,如果公共属性没了,进驻成本显然也会大涨,未必划算。

既然提供服务,收费当然是可以理解的。但问题在于,人们从未主动要与丰巢发生关系。丰巢的真正服务对象,更多是快递公司和快递员。毕竟对用户来说,放在快递柜和放在菜鸟驿站都是一样的,最好能送货上门。

快递柜就像是单元门里的报刊箱,真正解决好服务问题,不在于收不收费,而是将快递柜基础设施化。今年4月,商务部与国家邮政局联合下发通知,提出各地要明确智能快件箱、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的公共属性,将智能快件箱、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,提供用地保障、财政补贴等配套措施。

说白了,让快递柜往报刊箱的方向发展,成为现代小区必备且免费的公共设施,才是未来的趋势所在。丰巢收费引发的争议,或许会加速这一进程。



G图说

“薅孔雀毛”?

据央视报道,日前,在云南野生动物园里,一家人为了和孔雀合影,竟然上手抓扯,甚至脚踩孔雀尾巴,导致数根羽毛脱落,引得孔雀惨叫连连。园方介绍,被抓扯的蓝孔雀受到惊吓,所幸并无大碍,目前正在进一步观察。

一家人当着孩子的面轮流“薅孔雀毛”,如此言传身教实在让人汗颜。出游不文明行为,一方面与游客自身素质较低有关,另一方面,相关惩戒和震慑也不够有力。比如,此前报道过的踹断钟乳石、践踏丹霞地貌、脚踩伟人雕塑等不文明行为的当事人,或是被罚款或是被拉入“黑名单”,但“痛感”不明显的惩罚,难以真正遏制类似行为。因此,除了继续加强宣传引导力度,让全社会共同涵养文明出游的氛围外,更重要的是真正发挥出惩戒手段的力量。人在画中游,人本身也是一道风景。

李黎明/图 弓长/文

让电子证据新规助力劳动者依法维权

张智全

据中新社报道,职工通过微信向用人单位请病假在法律上算数吗?职工为同事或者用人单位到法庭作证需要遵守什么新规则?5月1日,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正式施行,它既为民事诉讼证据建立了新规则,也对用人单位制定实施规章制度、收集保管用工材料以及劳动者依法维权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司法意义上的电子证据,是指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,以数字化形式存储、处理、传输而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。微信、短信、网页、博客、微博客等电子数据能否作为司法意义上的电子证据,一直备受关注。如今,相关司法解释施行,上述电子数据被正式纳入司法证据的范畴,意味着完全可以作为证据在诉讼中使用。这对于

诉讼专业知识匮乏、证据收集能力较弱的劳动者来说,无疑多了一条简捷的证据收集路径,有助于其通过电子证据在维权诉讼中打赢官司。

电子证据具有直观性强、容易形成完整证据链等优势,但其长期以来充满争议,原因在于其与生俱来的易破坏、难保存,易修改、真实性难以鉴定等不足,这让司法机关对采信电子证据一直持谨慎态度。2014年2月4日最高法发布的关于适用新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,原则性地界定了电子证据的范畴,而对电子证据的收集、调取、真实性认定等没有作出细化规定。因而在司法实践中,尤其是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,电子证据未能全面使用。这不仅不利于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,而且在司法审理日益数字化的大背景下,也不利于提升司法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。

让电子证据成为劳动者维权的利器,是

信息化技术发展和运用的必然要求。在网络化用工模式中,劳动合同的签订、履行、解除或终止,用人单位的劳动用工管理等,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网路方式进行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要求劳动者在维权诉讼中按照传统方式举证,无疑推高了维权难度和诉讼成本。与时俱进地引入电子证据,让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应有作用,也是法律保护的题中之义。

要让电子证据发挥出预期作用,关键是要对其兴利除弊。此番正式施行的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,对电子证据的收集、调取、保全、质证和真实性认定,以及以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方式作证等,都作出了具体而又规范化的规定,期待其能释放出更多正面效应。

徒法不足以自行。期待各级法院能够在电子证据新规下,为劳动者依法守住应有的权益。

呼吁院前急救立法,也是在向公众传递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意义。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尝试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,来唤起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众急救的意识。比如江苏南京在2017年3月出台的《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》提出,红十字会应当依法开展医疗急救知识普及、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等工作,提高公众第一时间自救、互救能力。就在今年4月30日,南京市红十字会在地铁首批投放的AED投入使用后就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。显然,不论是呼吁完善院前急救体系建设,还是通过组织相关培训、实操,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增强公众的急救、自救、互救的意识和能力。对于挽救生命而言,这些都很有必要。

立法也是提升院前急救服务能力、处理应急事故、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契机。完善院前、院内救治衔接、一体化机制,利用“互联网+”、大数据提升医疗服务数字化、可视化的同时,建立与民政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医疗卫生信息、急救信息的共享制度,对于在以后应对突发事件、自然灾害等方面也将大有所益。

下午 3:52

工人日报

“前浪”“后浪”,都不必活成别人想象的样子

龚先生

今年“五四”青年节,宣言片《后浪》刷爆朋友圈。中老年人对年轻人“满怀羡慕”或许是真的,但“满怀敬意”甚至承认“不只是我们在教你们如何生活,你们也在启发我们怎样去更好地生活”,却并不常见。这是《后浪》最大的价值,也是它迷人之处、动人之处。

一代人终将老去,总有人正年轻。每一代人都需要活成别人想象的样子。求同存异,和而不同,美美与共,“前浪”“后浪”便可各自安好,共同“奔涌”。

网友跟帖——

@王一凡: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。

@许佳琪:当“后浪”勇往直前时,总会有“前浪”默默在背后支持。

遏制超标超前培训,开出“负面清单”后的行动更重要

张淳艺

小学低年级不能学习汉字生僻字、繁体字,也不能进行英语书写训练,整个小学阶段都禁止讲授国际音标——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六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(试行),为各地查处培训机构超标超前培训提供了依据。(见5月10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长期以来,校外培训机构超标超前培训现象十分普遍,新闻中的负面清单为违规培训划出了硬杠杠。

不过,有了负面清单并非一劳永逸。此前虽然没有这样清晰的红线,却也有边界。2018年8月,国务院办公厅出台《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,要求“培训内容不得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,培训班次必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,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县(区)中小学同期进度。”但有媒体调查发现,很多培训机构依然在进行违规培训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遏制超标超前培训,不缺规矩而是缺执行。一直以来,超标培训几近成为公开的秘密,却很少听说有哪所培训机构因此受到处罚。与负面清单相比,我们更需要的是加重处罚。加强巡查监测,畅通举报渠道,严肃查处并及时向社会通报,有助于以儆效尤,形成震慑。

校外培训机构在现实中异化为应试教育的“急先锋”,一方面因为家长们的“起跑线焦虑”,希望通过超标超前培训让孩子领先身位;另一方面,教育资源不均衡也在推波助澜。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培训班,希望在择校考试中脱颖而出。

遏制超标超前培训,不能是教育部门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,关键还要赢得家长们的理解认同,形成合力。首先要让家长认识到违背教育规律的超标培训,加重学生学习负担,反而容易使其产生厌学情绪、逆反心理,造成后劲不足。其次,更重要的是加快推进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合理配置。当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、有质量的教育,抢跑就失去了意义,超标超前培训也就失去了生存土壤。

G媒体声音

◇又出现高风险地区,弦真的不能松!

5月10日,吉林省公布舒兰市新增11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按照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,舒兰市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为高风险。

澎湃新闻评论说,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止。无论对一个地方还是对全国来说,新增病例清零的那一刻并不意味着可以刀枪入库。一个地方风险等级提高后,既要全面强化管控措施,也要反思、爬梳之前的漏洞,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,建立并完善及时发现、快速处置的制度能力。决不能让个别病例导致疫情反弹,决不能让局部风险上升为全局风险。

◇冒充领导亲属诈骗,“李鬼”们钻了什么空子?

近日,多起冒充领导干部或其亲属诈骗案件引发关注。有人冒充市委领导亲侄子,诈骗钱财上百万元;有人谎称“要去某市当市长”,向被害人承诺“当上省长助理的时候分他几百万”。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评论说,骗子伎俩拙劣,却仍有不少官员被忽悠,背后暴露出的原因,值得我们反思。在少数人心里,团团伙伙、亲亲疏疏的“圈子文化”的影响根深蒂固,虽已不敢明目张胆拉帮结派,却仍时刻幻想“贵人相助”从而“一飞冲天”。滋生“圈子文化”的土壤不除,“李鬼”就仍然有生存的空间。

◇教师兼职送外卖,别用道德绑架裹挟个人权利

近日,四川通江一名教师在节日期间兼职送外卖一事引发网友热议。在舆论压力下,这名教师已辞去外卖员兼职工作。《半月谈》发表评论说,评价教师应该从教学质量出发,而不应对其业余兼职过多干涉。部分网友脱离现实,居高临下地进行道德评判,有些道德绑架的意味,是对个人权利的过分裹挟。民生多艰,真实的生活往往是复杂的,如果隔着屏幕、一味用抽象的道德标准去评判,很容易对人们的合法权益造成伤害,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。(张子瑜整理)

弓长

据新华社报道,日前,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急救中心南区分中心副主任医师班宇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将继续递交有关推动国家层面急救立法的建议,呼吁对院前急救进行规范,完善院前急救体系建设,同时呼吁将每年的1月20日定为“国家急救日”,让更多人了解急救,具备急救意识。

院前急救主要是指在送诊前进行的院外医疗救治活动,具有随机性、急迫性、流动性等特点。

对于一些危重症病患来说,实施院前急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能否延续的问题。比如对于心脏骤停患者

来说,如果在“黄金3分钟”内采取正确的心肺复苏手段,或者利用自动体外除颤器(AED)对其进行急救,猝死的可能将大幅降低。

正是因为院前急救在抢救生命的前期环节发挥着巨大作用、扮演着重要角色,近年来,关于加快院前急救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。早在2013年,原国家卫计委颁布的《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》就曾对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建设、公益性质、救护车配置、医疗救护员设置、相关执业规范等提出了制度化、标准化的要求。

但从现实看,我国院前急救体系的建设与实际急救需求之间,仍然存在巨大差距。比如,随车担架工数量不足;老旧小区楼宇号牌缺失,耗时寻找导致延误救治,等等。这些

都对增强急救效果、提高病患的生命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。

推进立法进程,用制度性的规范引领院前急救体系建设是个好办法。比如急救人才队伍建设是构建院前急救工作体系的重点之一,用完善的制度来培养、留住合格的急救医生就显得十分重要。当前,急救医生数量有限、工作强度大,难以匹配现实需求,而培养急救医生不仅涉及相关专业,还在随机应变能力上有较高的要求,如在抵达急救现场之前如何远程指导施救,在医用耗材用尽时如何就地取材,在送医后与接诊医生做好衔接与沟通等等,倘若通过立法来引领相关体系构建,可以同时实现制度设计、专业人才成长、急救体系完善、百姓生命安全系数提高等方面的多赢。